

试论社科情报资源共享

尚志明

一、社科情报资源共享现状

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步子的加快,以及社科研究的繁荣,相应地要求社科情报资料“成龙配套”,然而,社科情报资源的开发、利用、共享的现状却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这具体表现为:

1. 文献情报资源短缺,不能满足用户需求,保障率低。一是我国人均文献藏书量和占有量过低。1980 年美国人均藏书量为 13 册,而我国在 1986 年人均藏书量仅 0.61 册。全国文献情报馆藏总量约 20 亿册,人均占有量仅 2 册,低于国际平均值。目前我国从事社会科学领域较高层次工作的约有 1348.1 万人,这种人均藏书量和占有量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二是年入藏量偏低。如高校图书馆,由于近几年书价上涨,购书数量下降,全国重点高校图书馆年入藏图书平均为 6~8 万册,仅为美国著名大学图书馆年入藏量的 1/4。三是国外文献的引进数量低,致使社科文献入藏率也随之偏低。有人将《世界高等教育百科全书》中列举的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的主要书目和期刊与北京 4 所大学的馆藏对照,发现入藏率最低的为 17%,最高的也只有 62%,平均不足 39%。

2. 文献情报重复浪费大,利用率低。主要表现在订购大型工具书和外文书刊方面。如台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每部 4 万多元外汇人民币,象这种虽有学术价值,但使用面很窄的大部头,长春市却有 4 个单位重复入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库全书》,大陆购买了书本型 200 多套,缩微型 100 多套,共用人民币 3000 万元,其中,上海就订购 7 套之多,每套 20 万元。继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影印该书,征订数量又达 700 多套,每套 5 万元,总金额又近 4000 万元。另据北图《1985~1989 年全国西文期刊联合目录》草片抽样统计,在《中图法》社科领域的 B、D、E、F、G、H、I、J、K9 个大类引进的外文原版期刊中,北京与外地的重复率,最高为 56.3%(语言文字),最低为 38.4%(政治),平均为 46.1%。过度的重复必然会造成外文原版文献引进品种减少,影响社科文献收藏的完备性。据特鲁斯威尔的 80—20 规律称,高校图书馆内 80%的读者用书集中在全部藏书数的

20%之中,也就是只要20%的馆藏数就满足80%读者的需要,剩下的80%藏书馆内读者的利用率相对较低,而其他图书馆的读者也许会使用。据抽样调查,我国高校图书馆文献利用率在30%左右,不少书刊从未被人利用过。就说以社科情报为特色藏书的复旦大学图书馆其馆藏利用率也只有10.2%。

3. 作为情报资源共享初级阶段的馆际互借活动开展较差。各图书情报部门只接受上层部门的信息或指令,没有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也没有形成系统。即便是馆际互借活动也只在部分图书情报部门之间开展,处于一种简单的、不稳定的、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只是一种低水平层次上的情报资源共享。有人对全国702所高校图书馆馆际互借情况调查统计,其中有305所图书馆没有反映馆际互借情况。其次是馆际互借量少。据对397所有馆际互借活动的高校图书馆统计,年互借量300册以下的图书馆有301个,占75.8%。

4. 社科情报资源的地域分布不平衡。我国社科文献资源的密集程度由东向西呈梯度递减态势,部分地方畸形密集。北京和东部沿海城市一带密度较高。以外文期刊分布为例,华北(包括北京)占53.5%,其中北京竟占40~50%;华东为33.7%,西南只有1.5%。这种状况,是与我国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和教育的地区发展态势相吻合的。然而有些地方过分密集,分布的不平衡会带来文献利用率低和使用不方便的缺点,使有限的文献情报资源在系统内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二、社科情报资源共享的障碍

1. 观念意识障碍。长期以来,在我国社科情报界存在着“大而全”、“小而全”、“自给自足”的思想,整体观念不强。有些社科研究人员往往习惯于依赖各自单位的图书情报部门,并对图书情报部门提出了求全的要求。如果收取一定的费用时,他们往往放弃情报资料,宁可选择在盲目封闭的状态下摸索,而将科研经费较多地投入到出版方面去,只愿“出版投资”,不愿“情报投资”,并对资源共享中适当的有偿服务提出异议。还有一些人没有认识到档案也是社科情报源的重要部分。上述用户需求意识不强和“求全责备”,使社科文献资源共享活动缺少强大的外部力量。对图情部门来说,“用户至上”的意识缺乏,还没有做到千方百计地为用户与其它图情部门“牵线搭桥”。有些图情部门怕协作后会影响到本部门的正常工作或吃亏。一些大馆自恃实力雄厚,不愿与它馆联网合作,至于中小馆则存大着依赖大馆心理。图情部门本身对资源共享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资源共享活动缺乏内部协调动力。在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局面及小农经济性质的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观念,是社科情报资源共享的主要障碍。

2. 管理体制障碍。目前我国社会科学情报管理体制仍然是分散多头的,基本属于纵向管理型。尽管在全国范围内,有部际协调委员会,在各省市有图书情报协作委员会,1986年12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在学术活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我国社会科学情报部门分别属于文化部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高等学校系统、党校系统、军事系统、党政机关系统。目前,这六大系统在全国尚没有一个权威性的跨系统的管理职能机构,没有建立统一网络。协调委员会没有行政干预权,社科情报部门处于一种纵横联系都十分松散的状态。这种分散多头领导导致社科情报资源失去宏观控制,造成情报资源自然布局,造成情报资源总体既贫乏又重复浪费的局面,降低了整体效益。

3. 标准规范障碍。目前,作为情报资源基础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进程较慢,许多环节还很薄

弱,缺乏全国统一的分类、著录、标引、检索标准和计算机网络规划,使全国社科图情部门处于“自成体系”的状态。一些图情部门的符号系统混乱无序,“新旧”分类法各自为政。同一本书,由于版本的“新旧”,采用两种分类法而各放一处。全国社科图情部门使用的分类法就有五大体系:《中图法》、《人大法》、《资料法》、《科图法》、《中小型法》。在著录方面,尽管有《总则》和《规则》,但一些图情部门仍没有按标准著录。加之我国的标准书号在1986年才由国家标准局批准,1987年正式实施,因此按著录标准著录的图书也只是近几年的新书,数量只能占馆藏的一部分。著录标准不一致,就不能编制联合目录。在计算机检索方面,由于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联机网络统筹规划,各图情部门的现代化进程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标准,而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眼前的需要,进行各自的计算机“小网”。现代化技术设备通过购买、赠送等多种渠道引进,型号性能不一。数据库也只考虑本馆的需求,因此互不兼容,不能实现联机检索,标准不一致是开展资源共享业务的最大障碍。

4. 现代技术障碍。社科情报资源共享,要求图书情报工作现代化,最主要的标志是联机检索。这要求借助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而这些在社科图情部门更是个薄弱环节,远远不及科技情报部门。在计算机硬件方面,配备不理想。目前使用最多的是IBM—PC机,只有为数不多的馆安装了M-150E等中小型机,这些计算机内存最大的不超过4MB,这种功能的局限性,难以建立大的联机终端。在计算机的软件方面,开发、应用的层次较低,主要用于书刊流通管理、采访编目的初级阶段,有的甚至仅为“电脑打字”这种低层次的操作应用,难以建立大型书目资料数据库,联机网络也不能真正建立起来,在通讯技术方面,电视电话机和传真机在社科图情部门更为罕见,当然就谈不上及时、方便地开展资源共享了。

5. 人员因素障碍。实现资源共享,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合格的专业“人才资源”队伍,即使有了充足的财力、物力,同样也是无法进行共享的。资源共享需要在图书情报服务的方式、手段、内容等方面讲求广度、深度和速度,这就要求图情人员必须具备多种知识的特殊技能。由于既缺少社会科学方面的专业人员,又缺少图情专业人员,使得图情部门总体智能结构和知识结构也缺乏合理性。即使有一些图情专业人员,也因为知识“老化”,而无法开展诸如计算机联网等工作。目前,计算机已发展到DBASEIII,如不及时更新知识,就无法适应资源共享的现代化要求。

此外,经费不够,缺乏必要的书目索引的编制等,所有这些都阻碍了社科情报的资源共享。

三、社科情报资源共享的对策

资源共享是指若干个图书馆共同发挥作用的一种工作方式。因此需要一整套的措施。如联成网络,合理布局;应用现代化技术;对社科情报资源共享提供法律保证;提倡资源共享职业道德;加强人员培训等。

1. 提倡资源共享的职业道德。首先要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这是社科情报资源共享的强大的内部动力,能起到法律形式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事实上,任何图情部门都不能满足自己读者用户的全部情况需求,而任何图情部门又要把满足读者用户的情报需求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这就要有一种强烈的义务和责任感,通过协作,以实现资源共享来解决这个矛盾。搞好资源共享的关键,是在观念上,要由追求单个图情部门“小而全”、“大而全”向寻求网络整体和资源共享的观念转变。这种整体协作应当是互相支援、补充馆藏,而作为馆藏丰富的大馆更有责任帮助较为贫乏的小馆,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只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倡奉献精神,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眼前和

长远利益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关系,以“为人民服务”这种思想品德作为图情部门的行为道德规范。每个图情部门都把自己的藏书和共享活动看作是整个社科情报系统藏书的一部分。参加每项协作活动都看作是对社科情报系统建设的贡献。只有这样,资源共享才有思想基础。

2. 结成网络,合理布局。联网要求通过馆际分工协调,使分散在各地区、各系统的各种类型的图情机构结成网络组织。这种协调形成的网络比低层次的合作更进一步。如最近成立的上海市西南地区图书情报馆(室)协作网,建立了上海西南地区外文文献目录中心。再如近来上海嘉定地区实行三大系统间的图书馆大联合,向网络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在社科情报布局的模式方面,应建立三级情报保障体系。第一级为国家级社科情报资源保障体系。主要按学科布局的模式建立。由北图、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重点高校图书馆构成,要能够满足全社会对社科情报的绝大部分需求;第二级为地区保障体系,要能满足本地区读者对社科情报需求的80%左右;第三级是社科各基层馆,主要满足本馆读者的日常需求。

3. 建立跨部门、跨系统乃至全国性的有权威的中心协调机构,建立全国社科情报资源协调委员会或国家社科情报局。在国家一级的机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为骨干,联合高校、军事、党校、党政部门和社科情报机构,组成全国社科情报网络。在网络内部分系统、分层次管理。在网络基础上产生的职能性领导机构,才都解决社科情报资源共享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才能真正制订出社科情报资源共享的具体实施方案,组织协调共享的各种活动。建立这样一个系统的全国的权威机构是克服资源共享障碍的根本措施。

4. 统计馆藏,编出书目。作为社科情报网络的一个成员馆,必须具备详尽的馆藏目录,这是实现社科情报资源共享的前提和准备。否则无法同其它图情部门进行资源共享的。因此,各成员馆要对现有文献资源进行普查,统计出现有图情资源的种类和册数,提供第一手资料,在搞清各馆收藏重点和馆藏特色及数量的基础上,先编出本馆的小目录,进而编制出诸如一、二、三级网络中心的联合目录,实现网络内各成员馆的多边协作。同时建立地区性的馆藏检索中心,让读者了解各馆馆藏。这也是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已有一些社科情报的报导刊物。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上海社科院情报研究所编的《文摘》(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界动态》;上海图书馆编的《全国报刊索引》(哲科版);上海师范大学编的《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以及目前上海图书馆等合编的《港台图书目录》,则采取以一馆做基础,其它馆作补充的方法,既缩短时间,提高效率,又可以做到分类、著录的统一,保证收录图书完备全面。

实现社科情报资源共享还要与人员培训、制定法规、统一标准、加速现代化步伐等问题配套实施。总之,实现社科情报资源共享,是目前社科情报系统的主要任务,有很多紧迫的问题要求我们着手去做。